

恽代英与中国工业文化的早期发展

严 鹏

[内容摘要] 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在近代中国成为一个文化母体，推动着社会变革。毕业并曾任职于该校的恽代英，在母校既汲取了工业文化的养分，又传播了工业文化。恽代英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以论战的方式鼓吹中国应工业化，大大促进了中国工业文化的发展，而其设想的中国工业化的新道路，也为中国工业文化注入了新的内涵。

[关键词] 恽代英；工业文化；中华大学；工业化

恽代英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被周恩来誉为“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恽代英也是最早主张中国应工业化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在中国工业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恽代英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武昌中华大学，曾任该校学报《光华学报》主编，毕业后又留校任附中部主任即附中校长。恽代英对工业文化的汲取离不开中华大学这一母校，又通过自己创造性的活动在母校传播了工业文化。此前学者的研究多在于揭示恽代英对于中国工业化理论或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思想贡献，^①部分学者探讨了恽代英经济思想的总体格局与演变路径。^②本文将从工业文化的角度出发来研究恽代英，并审视中华大学作为一种文化母体对于中国工业文化早期发展所起的作用。本文所界定的工业文化指的是一种主张发展工业与支持工业化的经济价值观，^③这种观念对后发展国家并非一种不言自明的社会观念，需要人为塑造。恽代英及其母校中华大学，在中国历史上就发挥了塑造工业文化的作用。

一、作为文化母体的中华大学

大学在社会的知识创造与文化传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于孕育新的思想或文化来说，大学往往是一种母体。包括大学在内的新式学校，在近代中国新文化形成与新思想传播中起着先锋作用。刘力研即指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所传播的新观念，影响了该校一批学生的观念和行

① 代表性成果如，李天华、李良明：《恽代英在中国工业化思想史上的理论贡献》，《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李天华：《关于恽代英〈中国可以不工业化乎〉一文的考证及解读》，《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3期；张荆红：《试论恽代英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形成的历史贡献》，《理论月刊》2006年第6期。

② 田子渝：《浅析恽代英的经济思想》，《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3期；潘大礼：《论恽代英经济思想的演变路径》，《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0期。

③ 详见严鹏：《工业文化的学理基础：对经济学史的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

动，使他们最终变成共产主义者。^① 创立于1912年的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及其附属中学在很多方面就是一种文化母体，推动着近代中国的变革。

中华大学没有特别煊赫的起源，但在中国大学史上有着自己的特色，是中国第一家不依靠政府也不依靠外国人创办的私立大学。^② 中华大学的创办与发展和教育家陈时的命运紧密相系。陈时，别号叔澄，湖北黄陂人，生于1891年，1907年留学日本，就读于日本庆应大学，深受其创办者福泽谕吉的影响，回国后毁家兴学。1912年，陈时利用父亲陈宣恺、伯父陈朴生的捐资，推动创办了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取“振兴中华”之意。开办期间，陈家先后捐出田地200石、白银3000两、官票5000串以及家中藏书3000余部。^③ 可以说，中华大学的创办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教育理想的实践。中华大学的首任校长为陈宣恺，1917年11月陈宣恺去世，由陈时继任校长。陈时本人缺乏高深的学问，其一生功业全在勉力维系中华大学的运营，但他苦心孤诣打造的这所学校，成为汇聚与传播新知识的空间，并衍生出其他新式组织，构成了一个文化母体。1937年，中华大学的校刊《中华周刊》登载了陈时在该校成立25周年时的采访记录，陈时在接受记者访谈时称：“大学为一个国家最高学府，作育人才的地方，它有启导社会思想，转移时代风尚，阐明学术，推进文化的功能……近代东西富强的国家，也都是有他的大学在做文化的基础，大学在一个国家的地位，其重要可想而知了。”^④ 以文化而求富强，可以说是陈时在中华大学办学的重要目标。

中华大学正式创立于1912年5月13日，最初名为“私立中华学校”，分设男女两部，当年8月开始招生就读，学生达到700余人。1913年，私立中华学校呈请教育部改为大学，1915年3月被教育部正式认可，以陈宣恺为学校法人代表，陈时为代理人。1915年7月，中华大学政法别科和大学预科的学生已经攻读各科3年届满，考试及格，准予毕业，成为中华大学第一届毕业生，有恽代英、余家菊、刘元龙、江涛、王安源等11人。^⑤ 1915年5月1日，陈时用5万银元创办了中华大学的校刊《光华学报》，取“光耀中华”之意，与校名相辅相成。在发刊词中，陈时写道：“智力竞争，愈演愈剧，惟学术实左右之。黄金世界，学术造之也；铁血精神，学术教之也；蛮族之淘汰，学术挤之也；白暂之雄长，学术拥之也。学术足以铸文明，而思想又适以母学术。”^⑥ 这段以历史进化论为底色的话，强调了学术与思想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以此为依据创办大学校刊，就是有意识地将中华大学打造为一个文化母体。1917年，《光华学报》从第4期起由恽代英主编。陈时继任校长兼法人代表后，制定了“成德、达材、独立、进取”的校训，又创办了《中华周刊》，该刊为每周六出刊的16开4版校刊，报道学校一周大事、国内外新闻并刊登学术论文、校友消息等。陈时还扩充校内图书馆，建立借阅制度，面向社会

① [美] 刘力研：《红色起源：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1903—1921）》，王毅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5—7页。

② 私立武昌中华大学校史组：《中华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页。

③ 陈庆中：《中华大学校长陈时的一生》，《武汉文史资料》1985年第2辑，第76—79页。

④ 私立武昌中华大学校史组：《中华大学》，第81页。

⑤ 私立武昌中华大学校史组：《中华大学》，第3—4页。

⑥ 裴高才、陈齐：《中华大学校长陈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87页。

开办平民夜校。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中华大学还创办了《学生周报》《新声周刊》等。^①中华大学的制度建设和人才培养，使其成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在武汉的重镇。

在组织的演化过程中，组织创办者的精神与偏好，是组织内部文化即价值观的重要来源。陈时的个人风格就影响着中华大学。陈时是一个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一方面，他自己甘愿过着简朴的生活，而将资源都投注于办学；另一方面，他始终从能力和资源的限度出发，为中华大学探索符合实际发展条件的道路。作为一个过渡时代的知识分子，陈时既有着近代留学生开风气之先的视野与魄力，又不乏传统儒家所推崇的经世抱负与力行品格。中华大学创办20周年时，陈时在纪念特刊上撰文称：“回忆二十余年之经过，艰苦备尝，有时潜心默祷，有时梦寐呼天，每遇年关节序，辄惊心动魄，算到难谋之时，亦曾动自杀成仁之念，旋即觉为小丈夫懦弱之行，用以自制，仍……向前迈进。”^②抗日战争时期，中华大学西迁重庆，陈时担任了国民参政员，在与周恩来的一次会见时，周恩来对陈时说：“我从你的学生恽代英那里知道你是一位清苦的教育家！”^③这个评价对陈时是恰如其分的。受制于创办人家族的家境，在私立中华大学的历史上，资源匮乏的问题始终难以解决。1918年7月9日，恽代英即在日记中写道：“母校缺少之人才三种：一教大学部专门之人才，中学理科之人才，办课外事领袖之人才。如此三种人才得所供给，则母校可完全改良矣。”^④一直到后期，中华大学仍然存在着教务处长严绂莘去附中老师缺课的班上代课的情况。^⑤然而，在资源匮乏的条件下，中华大学形成了一种踏实苦干的校园文化，弥补了其资源匮乏的欠缺，也塑造了其学生勇于任事的品格。1918年6月21日，恽代英在日记中记录了母校的精神：“雯初（廖焕星，武昌外国语专门学校学生，中共早期党员）言，我校人有一种勇于作事之特别精神，此甚足为我校人荣。未始非互助社成效显著，而仁社我校分子必多占上风之所致也……终何以保此令誉，以为母校争此光荣耶。”^⑥中华大学校园文化塑造的“勇于作事”的精神，使这所学校在中国近代史上发挥的作用，超越了其在近代中国高校等级体系中并不算高的地位。

中华大学作为文化母体发挥作用，主要依靠的是它的学生。从工业文化的角度看，中华大学与工业文化关联性最大的毕业生包括恽代英与经济学家王亚南。1938年4月，王亚南受邀回中华大学演讲“第二期抗战与国际形势”，他在开场白里说：“……兄弟在十年前，承校长、严教务长及各位先生的培植，献身社会，幸无大过，今天兄弟以校友资格，来和同学谈谈‘第二期抗战与国际形势’这个题目。”^⑦王亚南1923年考入中华大学教育系，毕业后即参加北伐军，投身国民大革命，大革命失败后流寓杭州，结识了郭大力，共同商定翻译《资本论》。1929年

① 私立武昌中华大学校史组：《中华大学》，第8—9页。

② 武昌中华大学武汉校友会编：《陈时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暨中华大学创立八十周年纪念专集》，1992年，第5页。

③ 陈庆中：《中华大学校长陈时的一生》，第84页。

④ 《恽代英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07—308页。

⑤ 胡起祥：《对我的母校——武昌中华大学的片断回忆》，载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室编：《爱我中华：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1989年，第159页。

⑥ 《恽代英全集》第2卷，第288页。

⑦ 周挥辉、董中锋编著：《中华大学在重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39页。

王亚南东渡日本，在东京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事写作并开始翻译西方古典经济学。^①可以说，王亚南所受经济学教育并不特别规范，他是怀着救国热忱以实际行动踏上经济研究的道路的。这一人生道路却颇合中华大学“勇于作事”的精神，尤其具有1920年代初期中华大学深度参与社会运动的校园文化特色。1949年，陈时曾不无自嘲地介绍中华大学：“……人们把中华大学比为皮蛋和臭虫。用皮蛋说明中华大学外形不美，校舍简陋；用臭虫说明中华大学学生成批成批地毕业的多，繁殖快，学生就业的数量比重大……”^②很显然，中华大学不是那种符合21世纪某种“民国范”想象的民国大学，不具备精英气质。^③但是，在那个风云变幻的过渡时代，中华大学依然是一个推动中国社会前行的文化母体。工业文化也是中华大学孕育与传播的新式文化之一。

二、中华大学时期的恽代英与工业文化

1895年8月12日，恽代英生于湖北武昌，1913年考入中华大学预科班学习。1914年，年仅19岁的恽代英就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义务论》。1915年，恽代英在中华大学的《光华学报》上发表《新无神论》，当年6月从中华大学预科毕业，9月考入中华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7年，恽代英应陈时聘请，出任《光华学报》主编，当年10月他组建成立了互助社，系当时武汉地区最早的进步社团。1918年6月，恽代英毕业于中华大学，又受陈时之聘，留校任附中部主任即附中校长，并教授国文、英文两科。1919年3月，恽代英指导附中学生林育南等创办《新声》半月刊，林育南后来也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期间，恽代英和林育南在武汉发动爱国运动。1920年1月，恽代英辞去中华大学中学部主任职务；2月，和林育南、廖焕星等开办利群书社，传播马克思主义，当年秋在武昌大堤口创办了利群毛巾厂；11月，赴安徽宣城的安徽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任教务主任。1921年下半年，恽代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④从恽代英的早期人生轨迹来看，1913—1919年堪称他的“中华大学时代”，他既被中华大学培养成才，又主动参与塑造了同样年轻的母校。1920年后，恽代英与中华大学的关系逐渐减弱，1922年后，他很少在武汉活动，直到1927年才回到武汉，又因汪精卫背叛大革命而离汉。1930年，恽代英牺牲于南京。在“中华大学时代”，恽代英已经和工业文化产生了关联。

工业文化的底色是现代科学，并具有社会进步的历史观，恽代英发表在《光华学报》第1期的《新无神论》中已经体现了这两点。恽代英在文中称：“昔者吾人乍见雷电之击人，则以为神主张之。今之略习物理者，则皆晓然以为无神矣……自世之有升降机，登高者固不梯而能升矣。自世之有汽船，航远者固不帆而能驶矣。凡昔之所以为不可信者，今则众目共见而不可诬。凡昔之所以为有神者，今则三尺童子，皆知其无神也。”^⑤《光华学报》的最早三期还连载过

①《王亚南文集》第1卷，福建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页。

② 吴先铭：《陈时与中华大学的几个片断》，《武汉文史资料》1983年第3辑，第121页。

③ 民国时代武汉有三所重要的大学，即武汉大学、华中大学与中华大学，分别具有国立、教会与民办的背景，其区别或如陈时常说的：“武汉大学是用国家的钱替国家培养人才，华中大学是用美国教会的钱替美国培养人才，中华大学是用中国社会的钱替中国社会培养人才。”其中，中华大学办学条件最差，处境最为艰难。详见陈庆中：《中华大学校长陈时的一生》，第80页。

④《恽代英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10—317页。

⑤《恽代英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12页。

恽代英的《怀疑论》，其论大体与《新无神论》相近，而提倡创新的文明进化观：“物质文明之进化，始于物理之发明，而发明之始基莫不起于疑世之不足论者为未必不足论，疑世之不足信者未必为不足信。”^①恽代英所举的例子，也包括了发达国家的工业新技术，如飞艇：“以欧洲之民，其所见奇技淫巧，日新月异，宜不泥于其耳目之见矣。然以德人，犹不能信徐柏林飞艇于未成功之先，即全欧各国亦莫不嘲为无希望之骨董修缮业。即今成功矣，然后瞠然自笑向者之陋，则是其见亦无以异于乡里农夫也。”^②值得注意的是，恽代英未尝出国，却能在武汉这一内陆腹地敏锐地搜寻国外新知，同时并不对发达国家盲目崇拜，这对于他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是非常有利的，也使他坦然向发达国家学习工业文化而不自我矮化。中华大学的校刊《光华学报》能刊登恽代英这种大胆质疑传统的文章，也体现出一种宽容的有利于工业文化等各种新文化传播的氛围。

从恽代英1917年的日记看，他对实业、科学等与工业文化相关的事物多有关注，此时的他虽受聘为《光华学报》的主编，但仍未大学毕业，还处于学习阶段，即仍在汲取当时中国社会已有的工业文化知识。4月17日，恽代英已经开始编学报，当天工作为“录中国今日对于欧战之大任务一遍”，在日记中洋洋洒洒写了不少关于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关系的内容，其中有一句：“吾之希望条件，非对于一国之事，如关税一事，日人有纺织业反对，英人有曼彻斯特省反对，俄法即因不能赞同。”^③此处所提到的关税，对于后发展国家工业化有重要意义，也是日后恽代英讨论工业发展问题时着力强调的内容。7月3日，恽代英与小他2岁的四弟恽子强讨论了爱迪生，日记中写道：“弟谓，使爱迭生于电学外，尚有所精，两者互相辅益，则其发明能力必更大。余谓，固然，然如爱迭生于电学外更骛他事，其电学或尚无今日之精亦未可知。故当业不精，患其不一，能精，则能博亦佳。”^④恽氏兄弟在讨论学习方法问题时提到爱迪生并以之为例，这从侧面反映了他们的启蒙知识中已经包含了发明创新等工业文化内容。7月27日，恽代英又与恽子强谈到“西人肯冒险为发明事业”，并总结西方人“发明事业之发达”的原因包括：“（一）教育稍能重启发式。（二）国家社会设各种奖励。（三）发明家多，故互相激励而前进。（四）凡稍改进器用者，皆谓之发明，故发明易于成功，而人因得激发。（五）社会需要较多，故易销行。（六）社会欲望甚高，故发明易受欢迎。”^⑤他们所讨论的发明，很大程度上就是经济学所界定的创新了，而营造鼓励创新的社会氛围是工业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恽氏兄弟在日常交流中对这些内容侃侃而谈，可以看到他们的思想已经被当时中国社会的工业文化所渗透。恽子强后来从南京高师理化部毕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这也可以视为恽氏兄弟汲取工业文化后的一种开花结果了。1918年7月9日，恽代英在日记中写道：“余意母校于文科外，至少应预先设法谋添理科，不然中学毕业优秀者皆他去，此校岂非为人忙乎？农科、工科渐备更善。现今有志者，志多在工科，此亦应注意事，惟母校

①《恽代英全集》第1卷，第19页。

②《恽代英全集》第1卷，第23页。

③《恽代英全集》第1卷，第442页。

④《恽代英全集》第1卷，第486页。

⑤《恽代英全集》第1卷，第499页。

恐不能为此耳。”^①恽代英看到了工科在中国社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吸引力，这是工业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而这种社会现象无疑也使敏锐的恽代英更准确地分析与研判了中国社会发展大势。

1918年3月25日，恽代英在日记中构想了创立“葆秀大工厂”的办法，其大略包括“得四五百元即可起始办工厂矣”，以及“工厂所营，如缝衣，织袜，乃至织布，造物，刺绣皆为为之。专收女子，其不能作工者聘人教之”。不过，恽代英最后写下的话是：“呜呼！屠门大嚼，未知何日能偿此愿也。”^②恽代英妻子名沈葆秀，1918年2月因难产逝世，恽代英的构想，包含了对亡妻的深切思念。从其构想来看，恽代英对于创办工厂颇有兴趣，这是他受工业文化影响的一种具体体现。恽代英对工业的包容与兴趣，和他成长于晚清崛起的工业重镇武汉亦不无关系。在民国初期的武汉，人们很容易对新兴工业习以为常。例如，1918年5月19日是一个星期日，恽代英与一群好友出发旅行，他在日记中记载的是：“同出汉阳门，见有新办聚庆工场。过平湖门、文昌门，见造纸厂。过望山门、王惠桥，见耀华玻璃公司。”^③武汉的工业文化氛围对恽代英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从1918年开始，恽代英日记对工业文化相关内容的讨论越来越集中于国货运动。保护本国工业是各国工业文化的应有之义，事实上也是工业文化作为一种经济思想的基本主张。在近代中国，这种经济爱国主义常常以国货运动的形式呈现。当时，恽代英与其互助社同人已经开始提倡国货，提倡国货可视为青年们爱国精神的自然延伸。1918年5月21日，恽代英在日记中写道：“以后在校拟发起印国货传单，募捐。”^④5月24日，恽代英在日记中称：“同人热心身体力行的提倡国货，其意殊可佩服。兹将可以代用洋货之国货众所传述者录下。余誓非万不得已不购外货矣。”^⑤第二天，恽代英就“偕全校旅行。乘官渡至谌家矶造纸厂，参观各机器房”，并评论了这次工业研学旅游暴露的问题：“造纸厂出品甚精。惟出品少而员役多，又出品拣择太严，殊不经济。因思中国商人之办工厂者，尚多不经济之处，何论官办？此所以中国商战之永不得胜利欤？今日招待学生，预备纸烟实为无意义之极。而学生抢取食物，尤为不堪。”^⑥恽代英此时已经在从企业的角度思考中国工业竞争力弱的问题。此后几天，他都积极为国货事业奔走，包括5月26日“调查国货”，5月27日“草国货传单稿”，5月28日记下了“调查国货之心得”，感慨“实地调查、颇可知市面国货贸易之实状”，其与工业有关的要点为：“棉业不改良，玻璃业不振兴，又工业之不肯研究，能制报纸而不能制纸箔，能制三角板而不能制云行板，又不能制铅笔，此时实国货不振兴之首因。”对于国货调查录的编法，恽代英也形成了自己的思路。值得一提的是，此时已近大学毕业的恽代英，在日记中也表露了留在中华大学服务的想法：“余尝思，果有机会可服务母校，当以养成学业一贯之人才为宗旨，将使此校为中国有名之大学，亦即因势成事之意也。”^⑦通过参与国货运动，恽代英的能力得到很大的提升。

①《恽代英全集》第2卷，第308页。

②《恽代英全集》第2卷，第189页。

③《恽代英全集》第2卷，第250页。

④《恽代英全集》第2卷，第252页。

⑤《恽代英全集》第2卷，第257页。

⑥《恽代英全集》第2卷，第257—258页。

⑦《恽代英全集》第2卷，第258—262页。

在1918年6月的毕业季，恽代英对国货运动的参与没有松懈。6月3日，他在日记中记下了《实业浅说》这本杂志，显示了其汲取工业文化的一种途径。6月4日，恽代英“在校编国货传单”；6月5日，恽代英决定进行国货问题研究，内容包括“中国商战每年漏卮为数约若干。现今每年赔款总额若干。现今每年还债总额若干。各国提倡国货之事实如何”；6月6日，“查考中国商战每年损失，不能得其数”；6月7日，“编国货单。九点半至校，查民国财政史”；6月8日，“编国货录”；6月9日，“编武汉国货调查录”；6月13日，“作武汉国货调查录白话序”，并“至电话局参观”；6月14日，“订用国货会草章至九点半”；6月17日，在日记中设想“提倡国货最妙为设一国货审查处，将一切疑似之国货或一切疑似本国商店之货品，一一陈列，任人各就所知批评之。如有切实证据，指明为外国货，则取消其陈列。又或意设一国货陈列所，陈列一切国货，注明若为本国原料，若为外国原料，或有外国原料几分之几，尤佳”；6月18日，与人商定协助救国团之事中包括“提倡国货”；6月29日，恽代英上午“赴校考德文”，中途出校活动，下午“回校中，国货调查录货款两清。惟本校除所付款外，尚有余款，只好留作下学期他项用费矣”；6月30日，“为国货调查录作五事，收束尚清楚”。^①至此，恽代英发起并参与的这次国货运动告一段落。不过，恽代英还是把倡导国货的理念坚持了下去，1919年2月12日，他在日记中记载：“寄《国货调查录》于粤汉路总车站。”^②实际上，恽代英知道国货运动的局限性，他在1918年6月20日的日记中尝言：“余前拟用国货会一事……余思此会不成。社会非有一班人先决定牺牲一切，以实行其用国货主义，以为社会先倡，将欲借纸上谈兵之国货调查录，以提倡国货，责人以难能，而自处于易，以此求其有效，不亦诬乎？”^③然而，真正的局限性尚不只在提倡国货知易行难，更在于此时恽代英等人所理解的国货运动存在经济上的不合理之处，如过于追求国货的国产原料含量等，势难成功。不过，在这场国货运动中，恽代英进行了中外贸易的研究，这为他日后提出的工业化理论奠定了学理基础。而恽代英进行研究时利用了中华大学的图书资源，也可以视为母校对其汲取工业文化的一种帮助。

五四运动期间，国货运动高潮再起，恽代英制作了《呜呼青岛》的小传单，在武汉散发，他在日记中自称，“劝人阅报纸，又劝排日货，此虽挑拨感情语，然亦利用机会以提倡国货之一法也”^④。此时作为中华大学附中校长的恽代英，将国货运动也扩展至了中学。1919年5月10日，恽代英除了“作《武昌学生团宣言书》”，还“为九班讲国事，勸以肯吃亏用国货”；5月21日，他“拟学生实行提倡国货团办法大纲”，其纲领为“入团者非不得已不用外国货”及“对社会于提倡国货尽调查劝告扶助之责”；5月25日，与人“谈提倡国货法”。^⑤恽代英在五四运动期间发起的国货运动，无疑借助了前一年运动的经验。

1919年1月4日，新年伊始，恽代英“又得《实业浅说》二册”。^⑥在“民国七年回想录”

①《恽代英全集》第2卷，第269—296页。

②《恽代英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72页。

③《恽代英全集》第2卷，第287页。

④《恽代英全集》第3卷，第234页。

⑤《恽代英全集》第3卷，第229、237—238页。

⑥《恽代英全集》第3卷，第143页。

里，他还记录了1918年2月“购《实业浅说》一年”。^①《实业浅说》是恽代英汲取工业文化知识的一个来源。该刊由农商部刊行，除了工业，也包含农业、商业的内容。《实业浅说》具有科普性质，但也传播了观念。例如，1918年2月10日出版的《实业浅说》第141、142期合刊，既有《洋烛制造法问答》这种工业知识科普文章，又刊登了郝树基写的《改良国货概说》，其中包含明显的宣扬工业文化的语句：“自从洋货入国以来，人人都爱买他，仿佛非他不可，可把我们原有的货物，反不去买，这个原故，虽说是大家厌恶旧的，喜欢新的，也是因为我们本国的货物，实在是有很不合用的，并且没人肯去想法子改良，所以人才不喜欢买。”该文还称：“用钱买国货，这钱是落在中国，若是买洋货，这钱可就落到外洋去了，你想我们国的钱，能有多少，如果永远往外国去，我们中国人，将来不要穷死了么？”^②很显然，《实业浅说》构成了恽代英工业文化知识理念的重要来源。在出任中学校长后，恽代英也按照自己的理想进行了一些改革，如强调“生活技能之养成：手工制造，化学制造，国文改良，小学教育研究”^③。1919年3月13日，恽代英在日记中写道：“校中化学制造已将由理想进为事实。所以为此，初不用以生利，只求同学亲身实验，自足养其科学兴味，趋向实业界者必较多，且切实做事之人亦必较多，则所得已伙矣。学风之培成，此必大助力之一也。”^④恽代英从中华大学这一母体汲取过工业文化，也通过在中华大学附中的任职传播了工业文化。

三、恽代英形成新的经济观

1919年10月1日，恽代英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当年12月中旬，他与路过武昌赴京的毛泽东等会晤并畅谈革命理想，是毛泽东创办的文化书社的信誉担保人之一。1920年1月，恽代英辞去中华大学中学部主任的职务，2月，他和林育南、廖焕星等合办的利群书社开业，该书社于1921年在军阀士兵的哗变骚乱中被焚毁。离开中华大学后，恽代英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利群书社最初与中华大学的书报贩卖部有关联，恽代英辞去中华大学的职务后，为保存代售新书报的场所，就在学校外面建了利群书社。恽代英称，利群书社“最注意的，不在营业，在于介绍文化”^⑤。尽管恽代英脱离了中华大学，但陈时校长以提供家具的形式支持了利群书社。^⑥中华大学作为文化母体所发挥的作用是持续性的。不过，此时的恽代英也逐渐由内陆腹地的武汉，走向了全国更大的舞台。

在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之时，恽代英的思想也在出现变化。1920年下半年，恽代英受陈独秀委托翻译考茨基的《阶级斗争》，1921年1月该书由新青年社出版。译书的过程应该也是恽代英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是最早提出工业革命理论的思想家，工业革命是现代无产阶级诞生的前提条件，也就是通往社会主义的物质起点。这种全新的工业

①《恽代英全集》第3卷，第357页。

②郝树基：《改良国货概说》，《实业浅说》第141、142期合刊，1918年2月10日，第3—4页。

③《恽代英全集》第3卷，第148页。

④《恽代英全集》第3卷，第192页。

⑤《恽代英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57页。

⑥私立武昌中华大学校史组：《中华大学》，第85页。

文化观，在《阶级斗争》里是有所体现的。书中所描述的工业史图景，出现了“工业革命”这个恩格斯最早创造的概念：“因科学的发达，特别更因汽力可以应用到实业界的活动，机械果然代了人工，这是一个工业革命。”^① 恽代英对工业革命的史实不会陌生，但马克思主义无疑提供了解读这些史实的全新视角。1921年，恽代英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对于工业文化的研究与传播都具有了与“中华大学时代”不同的意义。

1922年，恽代英在泸州建立青年团，并出任川南师范校长，此后以四川为主要活动基地，直到1923年夏赴上海。1923年8月，恽代英被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候补中央执行委员。9月29日，团中央二届一中会议决定由委员长刘仁静、秘书林育南、编辑恽代英和会计邓中夏组成团中央局。10月20日，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创刊，恽代英任主编，此后他陆续在该刊发表190多篇文章和通信，教育和影响了一代青年。^② 也就在此时，恽代英以媒体为阵地鼓吹中国应工业化。

1923年10月27日，恽代英在《中国青年》第2期上发表了《华洋贸易册中可注意的事》。该文列举了1922年的中国进出口贸易基本数据，得出了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对外贸易而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结论。恽代英在一种全球竞争的大格局下分析中国经济基础的脆弱性：“世界进化了，一切的国家在经济上都须彼此依赖，不能独立自给。所以闭关政策已经是过去的話了。不过我们仍旧须想一想，在今天这种战国的时代，我们衣食日用之所需，如此仰赖外国，最骇人的，去年棉货类仰给于英日两国各价一万万两以上，煤油仰给于美国的价五千余万两……如此我们岂非把全国衣食完全托庇于英美日本之下？英美日本若从经济上封锁我们，我们不要立列[刻]有冻馁之患了？”^③ 这段话值得大段直接引用，是因为它包含了恽代英最基本的分析思路。恽代英实际上并不否认贸易通商的重要性，也不认为在“世界进化”也就是全球化的时代能避免各国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更否定了“闭关政策”的可能性。但是，他同样正确地指出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也是资本主义列强军事冲突不断的“战国的时代”，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与政治军事的较量并行不悖。在这种大背景下，经济本身就可以被武器化，成为军事斗争的一种手段，也就是对他国采取经济封锁。事实上，在离1923年尚不遥远的刚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战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英国的经济封锁所致。^④ 因此，在列强有可能经济封锁中国的世界里，中国经济对列强的过度依赖是极端危险的。恽代英的经济观不是狭隘的纯经济观，而是一种视野宏阔且具有现实主义的政治经济观。这一点，确实也符合工业文化跨越狭隘经济性的特性。

在提示了读者可注意的危险之后，恽代英为中国开出的解决方案包含了发展工业在内的实业，即“最要紧是须改良农业，发达工业，以求必要的衣食日用物品，可以有个相当的自给”，但他特别强调了中国的弱项是工业：“我们对于制造工业，与原料生产的农业，应一样的注意。

①《恽代英全集》第4卷，第318页。

②《恽代英全集》第9卷，第318—319页。

③《恽代英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5页。

④ 严鹏：《溃于蚁穴：战时新兴工业强国的初级产品之困》，《文化纵横》2022年第5期。

然后我们可以在经济上有个独立的地位。”^①应该说，恽代英在这篇文章中所用的方法，就是他此前在中华大学研究中外贸易的方法，其观点与提倡国货的思路也非常接近。但此时的恽代英看到了单纯的经济办法解决不了中国的经济问题。他在这篇文章中的最后结论是：“要扑灭武人的专政，要建设统一的人民政府，要取消国债的本息，要收回关税的主权。”^②此时的恽代英，固然是在传播工业文化，更重要的则是将工业文化纳入了革命斗争。

就在几天之后的1923年10月30日，恽代英化名“戴英”在具有影响力的大报《申报》上发表了《中国可以不工业化乎？》。这是一篇论战檄文，对于中国工业文化的早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四、恽代英参与立国问题论战

192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批反对发展工业的知识分子，并在思想界掀起了一场“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大论战。这次立国问题的大论战对于工业文化在中国思想界的巩固意义重大，恽代英参与其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必须工业化的主张，为中国工业文化注入了“红色基因”。

一般认为，章士钊的文章是这场大辩论的引子。1923年8月，章士钊发表了《业治与农》。章士钊称第一次世界大战系“英德两国，为争工业之霸权，创开古今未有之大战局”，这证明了“当世工业国所贻于人民之苦痛何若，昭哉可观”，进一步说，“世界真工业制之已崩坏难于收拾也如彼”。在西方似乎已经表明工业文化危害极大之情况下，中国人要发展工业，在章士钊看来，实在“不智之甚”，且“未成为工业国而先受其习之毒”^③。章士钊的文章登出来后，立即有人撰文反驳。当年9月，孙倬章发表了《农业与中国》，10月，杨杏佛发表了《中国能长为农国乎》，皆对章士钊的观点提出了批评。而章氏于11月发表《农国辨》予以回应。在这篇文章中，章士钊从中国先哲老子的观点出发，区分了农业国与工业国的不同文化特质：“农国讲节欲，勉无为，知足戒争，一言蔽之，老子之书，为用极宏，以不如此不足以消息盈虚，咸得其宜也。工国则反之，纵欲有为，无足贵争，皆其特质。事事积极，人人积极，无所谓招损。”应该说，章士钊对于农业国消极无为、工业国积极进取的文化特质还是把握得很准的，但是，他对于消极无为文化的推崇显然是有问题的。而他认为中国“乍经鸦片战争之大创，锐意维新”是“以犬羊之质，服虎豹之文”，最后只能“外强中干”，而西方工业文化经过世界大战后，“今也王气已收”，更不值得学习。^④仅从文字上看，章士钊的立论仍不脱传统农业文化之窠臼，以此来诊断现代工业社会的病症，不无刻舟求剑般的时空错置感。

章士钊有他的支持者。1923年10月25日，学者董时进发表了《论中国不宜工业化》，与章士钊的《业治与农》遥相呼应。不过，与章士钊不同的是，董时进的文章更具学理性。首先，与章士钊一样，董时进也认为在当时的世界上，“工国运命，已濒厄境”。至于为什么工业国快

①《恽代英全集》第5卷，第125—126页。

②《恽代英全集》第5卷，第126页。

③章士钊：《业治与农》，载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下），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742—743页。

④章士钊：《农国辨》，载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下），第779—782页。

完蛋了，董时进给出的解释是，世界市场是有限的，各国工业早已产能过剩，整个地球已无法再消化。基于这个极其简单的理由，董时进问道：“中国处此工国多余之时，尚可工业化乎？”继而，他又指出，即使中国如德国之于英国那样成为一个“打倒他工业国”的“后进工业国之健者”，也需要两个条件：一为兵力，二为经济力。他再次悲观地问道：“二者我有其一乎？”于是，中国既无必要工业化，也没有能力工业化。反过来，董时进认为农业的优点在于“能使其经营者为独立稳定之生活”，其弱点虽为“不易致大富”，却正好“可以补贫富悬殊之弊”。总之，他认为，“有长远之农史、广大之农地、良善之农民”的中国就是应该发挥长处，而不要强行发展工业“与西人为我占劣势之竞争”。^①应该说，比起章士钊那些玄之又玄的理由，董时进的立论尚称有据。

恽代英的《中国可以不工业化乎？》正是为了批驳董时进。在这篇文章中，恽代英首先分析了农业国不可能脱离工业国和工业而独立存在，因为工业提供了农业国需要的基本生产工具：“人非能餐稻麦，稻麦必须碾磨。碾磨乃工业之事而非农业也。人非能衣棉丝，棉丝必须纺织。纺织亦工业之事而非农业也。”^②恽代英指出，在中国没有卷入资本主义全球化之前，固然能依靠自己的手工业提供基本生产工具，但“闭关”时代结束后，发达国家“有进步的机器、伟大的工厂”，生产的食品、衣服“成本低、成品良”，中国的手工业无法与之竞争，这导致中国“衣食之所需，乃转而大宗须仰给于外国”。^③既然闭关自守的时代已经回不去，则无法奢谈中国脱离工业国而独自保留农业国形态。在这一论点，恽代英进一步展开的是，根据1922年海关报告，中国进口超过出口“将三万万元”，这意味着“总共有产生将三万万元之农人、工人，俱为外国工业所压迫而至于失业”，产生的连锁反应则会“国内军队、土匪之充斥”而农业无法带来“独立稳定之生活”。^④恽代英在这里阐明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全球竞争时代的传统农业是无法维系社会稳定的。

其次，恽代英针对董时进所谓中国工业化会导致“外资之纠葛”的论点进行了批驳。恽代英从现实出发，指出“外资之纠葛”不必等到中国将来工业化时才发生，“眼前逼近眉睫之事”已经“不胜枚举”，如外资染指开平煤矿、大冶铁矿所造成的纠葛，皆为现成案例。他进而指出，中国实际上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列强的经济半殖民地，在这种前提条件下讨论避免与列强发生经济纠葛，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中国在先进工业国之下，已成为经济的隶属关系。至今日尚虑工业化之为外人染指，诚不知其何说也。”^⑤针对董时进与章士钊都讨论过的农业国文化优于工业国文化的问题，恽代英也用中国贫弱的现实进行了反驳。董时进构建了一种理想化的农业国文化，如“农业国之社会安定太平，鲜受经济变迁之影响，无所谓失业亦无所谓罢工”等，恽代英指出这些想象统统与作为农业国的中国的实情“全不符合”。^⑥在这一论点，章士钊展开

① 董时进：《论中国不宜工业化》，载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下），第768—770页。

② 《恽代英全集》第5卷，第128页。

③ 《恽代英全集》第5卷，第128页。

④ 《恽代英全集》第5卷，第128页。

⑤ 《恽代英全集》第5卷，第128—129页。

⑥ 《恽代英全集》第5卷，第129页。

论证的是，中国的乱象皆系“农业国而强效工业国之过”，恽代英则反问章士钊中国是否可以通过捣毁铁路、商船、工厂而“复反于农业”，并反问中国毁掉已有的工业设施后是否能阻止工业国的经济渗透。^①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恽代英进一步指出，董时进看到了中国人自“中西接触”后而变得贫弱，却没有深入考察中国人贫弱的原因。恽代英认为，中国在“中西接触”后贫弱的原因是“国人之生路俱为外国工业之所压迫而日趋逼狭”，要解决问题只有正面对抗即发展自己的工业：“此非吾之工业有以与外国相抗衡，盖惟有万劫而不复。岂尚得谓中国不宜工业化乎？”^②换言之，董时进等人设想的以农立国是面对全球工业化的攻势而退缩自保，恽代英则主张主动工业化以寻求在全球格局中的优势地位。

恽代英批驳董时进的最后一条论点涉及工业国无法脱离农业国而存在。的确，工业国依靠农业国供给原料与提供市场，这使工业国“非有农业国不可以自存”^③，似乎是农业国的一种优势。但恽代英以全局性的政治经济观指出，工业国可以将工业优势转化为军事优势，并以军事优势抵消前述农业国所具有的某种经济优势。他的原话是：“工业国……势必挟其工业之优势，以窥窃农业国之统治权。”^④英国对于殖民地的获取就是历史与现实的例子。恽代英通过英国的例子，指出农业国一旦沦为工业国的殖民地，就永远只能成为母国的原料供给地和产品销售地，其结果是“母国之人经济上处处占取优势”，这固然也体现了“工业国之不能离农业国而独立”，却绝非农业国的幸事。^⑤至此，恽代英批判了董时进的全部论点，而抛出了掷地有声的结论：“然则中国亦必化为工业国然后乃可以自存，吾以为殆无疑议。”^⑥比起单纯鼓励理工科教育与提倡国货，恽代英此时的主张，已经是工业化这种系统性的现代化方案了，体现了一种内涵更丰富的工业文化。

当然，恽代英也认识到工业化是一种极具难度的复杂方案。他在《中国可以不工业化乎？》的结尾提出了中国必须靠工业化生存于世界的主张后，也指出了中国工业化的困难，并称将进一步讨论该问题：“中国如何能与外人竞胜而化为工业国？中国而化为工业国又何以免于生产过剩之患乎？请俟他日另文论之。”^⑦此后的恽代英实际上并没有再专门讨论过工业化问题，但他此时一定已经有了答案，那就是：中国要靠革命缔造工业化的前提条件，并通过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来避免资本主义工业国的生产过剩危机。恽代英此后的一些文章里都涉及了这一点。例如，1923年12月15日，恽代英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研究社会问题发端》一文，提出：“社会主义是要公有机器工厂及一切规模的生产事业，这些东西在中国今天都是很少的。中国要对付外国工业，必须收回关税主权，实行保护政策，发达本国产业，安辑无业游民……由革命政府收回关税主权，用社会主义的精神去发展产业。”^⑧这一论点的经济学理尚不脱离德国历史学派

①《恽代英全集》第5卷，第129页。

②《恽代英全集》第5卷，第129页。

③《恽代英全集》第5卷，第129页。

④《恽代英全集》第5卷，第129页。

⑤《恽代英全集》第5卷，第130页。

⑥《恽代英全集》第5卷，第130页。

⑦《恽代英全集》第5卷，第130页。

⑧《恽代英全集》第5卷，第254页。

的基本主张，即强调要用关税保护本国工业，是一种普遍流行于后发展国家的工业文化。但恽代英在这种经济爱国主义理论之外，更强调“社会主义”。他称德国历史学派所信奉的“社会政策”其实“不能解决社会问题”，而“只有社会主义，才是根本的解决”。^①在1924年的《革命政府与关税问题》一文中，恽代英也分析了工业化、关税与革命之间的基本逻辑，其结论也指向了要靠革命为工业化开辟道路。^②同年，在《如何方可利用外资》一文中，恽代英再度与董时进展论战，其结论已经直接提出了要学习苏俄：“中国将来是应当仿效苏俄的。应当仿效他们建设一个公忠而坚固的政府，应当仿效他们用极严重的条件，利用外资以开发富源。”^③受限于时代与条件，恽代英没有系统化的工业化理论构想，但对于他自己在《中国可以不工业化乎？》结尾提出的问题，他显然是有答案的，这一答案，在他英年牺牲后，也将被他的中国共产党同志们继续探索，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五、余论

1924年，印度文化名流泰戈尔访华，5月曾在武昌演讲，据称与中华大学亦有密切关系。^④不过，当年4月19日，恽代英倒在《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上发表了一篇泼冷水的文章——《告欢迎泰戈尔的人》。对泰戈尔倡导的源自印度的“森林文明”，恽代英不以为然，称：“当前的，是民族的生存竞争，没有时间容我们冥想，而且也令我们没有余暇去存这个与神调和的奢念。要现在备受物质压迫的人，去梦想古代在热带中那种不劳而食的生活所产生的文化，实在是时间错误了。”^⑤进一步说，恽代英指出：“现在决不可以还梦想有回到森林间去的日子。然而现在我们并不是没有别的希望。机器的进化，生产力的增进，已经可以很丰裕的，供应全人类的要求。不过可惜生产工具还在西方国家少数人手里，他们不肯尽量使用机器的生产力；反之，为他们的利益，常常要限制生产。现在最要紧的一着，是把这种工具夺到全人类的社会手中来；换一句话说，便是要世界的社会革命。”^⑥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具有工业文化色彩的世界观。而恽代英此时与他自豪的母校不同调，作为一种独立人格的彰显，却恰可反证其母校的光荣。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特邀研究员

①《恽代英全集》第5卷，第254页。

②《恽代英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17页。

③《恽代英全集》第6卷，第295页。

④ 裴高才、陈齐：《中华大学校长陈时》，第159—160页。

⑤《恽代英全集》第6卷，第239页。

⑥《恽代英全集》第6卷，第242页。